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回忆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

HUIYI FABI JINYUANQUANYUHUANGJINFENGCHAO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回忆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

HUIYI FABI JINYUANQUANYUHUANGJINFENGCHAO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忆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10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6773 - 8

I. ①回… II. ①全… III. ①货币史 - 中国 - 民国 IV. ①F8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4535 号

责任编辑: 张春霞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开

印 张: 14.5 字数: 144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百年中国记忆·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王太华

副主任 卞晋平 王国强 方 立 龙新民 刘德旺 孙庆聚
闵维方 陈光林 林淑仪 周国富 梁 华 谭锦球
翟卫华 陈惠丰 韦建桦 张研农 陈建功 南存辉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 捷 王文章 王兴东 王怀超 左东岭 龙新南
叶培建 冯佐库 吕章申 邬书林 刘 春 刘兆佳
李 捷 李东东 李忠杰 杨冬权 励小捷 余 辉
汪 晖 张 皎 张廷皓 张晓林 陈 力 林 野
单霁翔 赵 卫 赵长青 俞金尧 施荣怀 袁 靖
聂震宁 黄书元 黄若虹 黄嘉祥 崔永元 梁晓声
彭开宙 葛晓音 韩 康 廖 奔

主 编 陈惠丰

副主编 刘晓冰 沈晓昭 张燕妮 刘 剑 韩淑芳

编 辑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卜伟欣 马合省 王文运 牛梦岳 卢祥秋 刘 夏
朱闻宇 全秋生 李晓薇 张春霞 张蕊燕 金 硕
赵姣娇 胡福星 段 敏 殷 旭 徐玉霞 梁 洁
梁玉梅 程 凤 詹红旗 窦忠如 蔡晓欧 薛媛媛
戴小璇



回忆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

目 录

国民党政府在法币改革前后依附帝国主义和
彼此间钩心斗角的内幕

资耀华 周 林 甘培根 / 1

法币实行的前后 戴立庵 / 42

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崩溃 资耀华 / 48

金圆券的发行和它的崩溃 黄元彬 / 60

王云五与金圆券 寿充一 / 75

金圆券发行后蒋介石在上海勒逼金银外汇的
回忆 戴立庵 / 81

蒋经国上海“打虎”记 寿充一 / 92

关于执行“经济管制”的上海青年

服务总队 方庆延 / 101

我所亲眼看到的通货膨胀内幕 朱 侠 / 109

孔祥熙、王云五与通货膨胀 祝世康 / 127

金圆券发行前的一段旧事 李立侠 / 134

国民党政府发行银圆券之谜 杨志信 / 140

- 关于东北流通券 杨志信 / 150
- 抗战后期重庆的黄金风潮 戴立庵 / 153
- 轰动重庆的黄金舞弊案 祝世康 / 158
- 记上海黄金风潮案 何汉文 / 163
- 1947年黄金风潮的内幕 沈日新 / 186
- 回忆中央银行黄金案 李立侠 / 199
- 1945年重庆法院审理黄金储蓄案内幕后 于凤坡 / 209

附 录

- 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关于发行法币宣言 / 214
- 金圆券发行办法 / 217
- 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摘要） / 220
- 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摘要） / 223



回忆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

HUIYI FABIJINYUANQUANYUHUANGJINFENGCHAO

国民党政府在法币改革前后依附帝国主义和彼此间钩心斗角的内幕

资耀华 周 林 甘培根

1935年11月4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为了加紧进行内战，巩固其法西斯统治，强制实行货币改革，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简称法币），逐渐收回三行以外的钞票；将白银收归国有，限期以法币收兑；法币的汇价由三行无限制地买卖外汇来加以维持。当时国民党政府把法币说成是“一种极温和、极合理、尤其适合国情之货币制度”。孔祥熙和宋子文亲自出马为法币进行欺骗性宣传，声称“停止行使硬币，既非通货膨胀，亦非纸币政策”，“每百元钞票可有110元以上之



外汇准备，则政策维持币值之能力，更不应成为问题矣”。他们甚至把法币的汇价吹嘘为具有充分的独立性。总之，在他们的心目中，法币是一种合乎时代潮流的独立自主的管理通货。

对于国民党政府在水币改革上所玩弄的这一骗局，我们有必要加以彻底的揭露，本文根据有关史料和个人当时的一些亲身经历，着重揭露蒋介石政权在水币出笼前后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和帝国主义间彼此钩心斗角的一面，并力求弄清当时的一些历史事件的真相，对一些问题提出我们的初步看法，借以展开讨论和进一步的探索。由于我们水平不高，掌握的资料也不够全面，文中难免有不少错误之处，还希读者指正。

一、法币改革的历史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阶段。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当时不仅卑躬屈膝地向日本妥协投降，而且还丧心病狂地加紧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疯狂扩军，积极“剿共”，结果使军费支出浩大，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①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128页）。

在1929—1935年期间，蒋政权财政支出中最大的项目就是军费，每年军费支出均占该年财政总收入的1/3以上，其中1930年和1931年竟占40%以上。^①

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强其统治，筹措巨大的军费，自它在南京建立政权起，就一直策划在金融领域内加强统治，其中主要措施之一就是要实行币制改革。1928年，国民党政府在江浙财团的支持下先后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就曾通过决议，要实行币改，推行纸币和实行金汇兑本位等。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的成立以及1933年的废两改元都是实施这一庞大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中国农民银行，更是蒋介石为了要筹措“剿共”军费而亲自出马开设的。1934年，在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蒋介石集团更加快了它吞并中国金融事业和垄断纸币发行这一计划的步伐。

据资耀华回忆，自1930年2月海关关税改收关金券、1933年4月6日实行废两改元、同年7月1日取得中央统一造币权后，蒋政权已着意筹谋统制全国财政金融。除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外，并拟吞并中国、交通两行。1933年春，资耀华正随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视察长江流域各埠上海银行分行。到达九江分行时，陈光甫突然接到张公权由上海拍来急电，要陈光甫火速回沪共商要事。陈当即返沪，我们则继续沿江而上。后来我们视察完毕由渝回申，才得悉当时由孔祥熙主持的财政部正拟秘密计划发行金融公债1亿

^① 杨格：《中国建国之努力》附录一、433—439页。



元，作为增加中国、交通两行及其他三家发钞银行官股资本之用。由财政部先写了一张2500万元金融公债预购券交中国银行作为增加官股，连原有官股资本，合计为官六商四之比。张公权自知无法完全抵制，拟筹开常董会、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商讨对策。在召开这些会议之前，拟先与浙江第一银行总经理李铭（当时是中国银行董事长）及陈光甫（当时是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事先秘密商谈，认为如果完全抗拒不太可能，则只好争取官商股权各半，因陈光甫与孔祥熙私人关系较好（同属留美学生组织的一个兄弟会），所以请陈光甫向孔祥熙陈述内情，希望官商股权各半，孔祥熙慨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即从中国银行收回1000万元金融公债预购券。不过，官商股权各半的目的虽已达到，可是历来由上海金融势力左右南京政治势力的形势已转变为南京政治势力完全支配上海金融势力的局面了。果然，1934年3月召开中国银行股东大会时，即由财政部令派宋子文、叶琢堂、席德懋、钱新之、胡笔江、宋子良、杜月笙、吴鼎昌、王宝嵩9人为官股董事，并指派宋子文为董事长，指定宋汉章为总经理，令调原中国银行总经理为中央银行副总裁，至商股董事因任期未满依旧留任。同时交通银行也同样增加官股，但因钱新之与蒋介石有特殊关系，依然留任董事长之职，交通银行总经理则由CC派的骨干赵棣华担任。从此中国、交通两行即为新官僚资产阶级所完全掌握了。同年5月，又对中国通商、四明、中国实业三家发钞银行依然用公债券加入官股，夺取了它们的经营管理大权。通过这一系列攫夺纸币发行权的措施，使蒋政权基本上掌握了旧中国的纸币发行权。但是，这时发行的纸币是要兑换银圆的，在性质上

还是银行券，使蒋政权不能为所欲为地任意发行纸币，因此，一有机会，它必然要推行其梦寐以求的不兑现纸币，即由“国家所发行的强制通用的纸币”。^①1935年11月所实行的法币，正是国民党政府在实行其不兑现纸币政策上所采取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步骤。

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上的争霸形势也出现了新的特点，那就是美、日两国崛起，英国日渐衰落，形成了美、英、日三国在中国角逐的新局面。

美国对华出口贸易已由1913年只占中国进口总额的6%增加到1934年的26.16%，跃居第一位。在华投资方面，美国虽仍比较落后，但已有后来居上的趋势。在同一时期，日本在华的经济势力也急剧增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仅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入侵华北，而且对长江流域和华南也形成了威胁，在华投资方面，日本更大有超过英国之势。日本在华投资在1914年仅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13.6%，到1931年已上升至35.1%。同一时期，英国对华的输出已落在美、日两国之后。1934年，中国进口的英货只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2%，而该年美货则占26.16%，日货占12.21%，都超过了英国。在华投资方面，尽管1931年英国在各国在华投资总额中仍占37%，居第一位。但这时日本已急起直追，跃居第二位。^②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955年版，85页。

② 上海浙江实业银行：《罗斯爵士来华使命之分析》（《东方杂志》32卷20号5—11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在财政金融领域内对帝国主义的依赖也进一步加深了。蒋政权承袭了清封建统治者和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的衣钵，在财政金融上处处依赖美英和洋顾问，特别表现在对美国及美籍顾问的依赖上，例如甘末尔设计委员会就是1928年秋孙科访美时安排的。该委员会在中国待了一年，它建议在币制上中国应逐渐实行金本位。后来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生大恐慌、银价下跌、中国国内政局不稳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这一计划的主要部分未能实现。在甘末尔委员会停止工作后，它的一些主要成员仍继续留在中国，在国民党政府中充当重要的财政金融顾问。例如，克利夫兰先担任预算顾问，后来出任盐务稽核总所会办；罗克哈特先担任财政税收方面的顾问，后来于1935年继克利夫兰担任盐务稽核总所会办；林奇担任中央银行顾问；杨格^①担任公共信贷和货币方面的顾问；华莱士和瓦特森曾短期担任过关税和会计方面的顾问。正如杨格自己所说：“国民政府接受外国人意见和技术援助最多的是在货币问题方面，主要的事例是1930年采用了（甘末尔委员会建议的）海关金单位，应付银价波动和1934年放弃自由银本位，1935年实行的币制改革……在这些领域内，特别是在拟订1935年的币改方案上，林奇、罗克哈特和我都积极参与了。”^②

① 杨格为蒋政权的首席财金顾问，曾一身兼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财政部、中央银行和中国航空公司的顾问。

② 杨格：《中国建国之努力》341—342页。

二、美国抬高世界银价加深了中国的经济危机

1933年7月美国在伦敦国际经济会议上签订了白银协定，承担了稳定世界银价的责任，可是它却于1934年6月颁布“白银法案”，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从而抬高了世界银价，完全背弃了协定规定的义务。1934年底世界银价比上年上涨26.7%，在世界银价暴涨下，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特别是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更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机，大量运出白银，牟取厚利。1934年1月，上海外商银行手中存银计有2.75亿元，约占当时上海中外银行存银量的49.2%，但到1934年底时，上海外商银行的存银量下降到只有5400余万元，比同年1月存银量减少2.2亿元。^①

白银的大量外流使中国贸易入超加剧，外货倾销，出口困难；工厂倒闭，失业增加；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村破产；银根转紧，金融发生恐慌。1935年2月1日，国民党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在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将美国抬高世界银价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概括为下列六点：（1）1934年中国白银净出口量（走私在外）为2.57亿元，其中5/6是在美国通过“白银法案”到1934年

^① 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十年来中国金融史略》40—41页。

10月15日中国征收白银出口税时不到四个月中运出的，使1934年中国白银出口量为中国历史上白银出口最高年份1907年的五倍。

(2) 上海存银量由1934年6月底的5.44亿元下降到目前的3.12亿元。(3) 自1934年上半年以来，钱庄向客户索取的一般利率已由年息6厘上涨到本年1月1日的2分6厘。(4) 1934年下半年的对外贸易总额比上半年下降16%，自去年7月以来，政府和实业债券的价格下跌10%，上海中心地价下跌15%，工业证券下跌7%，商业倒闭在各地蔓延。(5) 银根紧缩损害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使得银行几乎无法放款。税收，特别是关税，受到目前趋势的严重威胁。(6) 通货价值的上涨对中国实为一种灾难，因为它带来了通货紧缩。^①

据资耀华回忆，1934年末及1935年中，我正在天津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其时上海白银源源外流出口，华北白银由日本浪人大量走私偷运，1934年下半年，白银外流就达2亿元以上，因此金融恐慌由上海波及全国，几十家银行和上百家钱庄倒闭，其他勉强生存的银行、钱庄，有的钞票挤兑应接不暇，有的流动资金周转不灵，以致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当时上海各大银行的总行都纷纷急电外埠各地分行，命令尽量将现金汇往上海支援总行，先巩固总行基础，否则总行一垮，分行当然不能存在了。因此，各地分行只要有点余力即尽量汇往上海支援总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当然也不例外。记得当时上海银行天

^① 《中央银行英文档案》。

津分行有定、活期及储蓄存款近700万元，也因极力支援上海总行，有时库存现金只有9万余元，等于唱空城计，情况十分危急。1935年中，总行电召商议行务，我往返津沪达四五次之多，尤其1935年春末，一次总行电召赴申，到达上海后，当天即由上海银行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徐新六、浙江第一银行李铭约在饭店密商，要在上海创立一家不动产抵押银行（名字未定），拟将各大银行所持有的不动产道契集中起来，仿照日本劝业银行的经营办法，以这些不动产作为资本大量发行公司债券吸收市面流动资金，企图变死钱为活资金，借以渡过金融紧迫的难关。一方面草拟章程呈部申请立案；另一方面要我速去日本东京向日本劝业银行接洽，将该行经营管理及如何发行债券等那一套办法引进来作为蓝本，同时并调查研究日本金融界怎样渡过1928年金融大恐慌那个难关的经验，以作为解救上海金融恐慌的参考。我到东京后正在走访各大银行负责人并在日本劝业银行搜集整套规章制度和各种资料期间，又突接上海总行急电：中止进行，即行回国。我回上海后，才得悉宋子文要把持这个组织，条件是由宋子文兄弟宋子良担任这个银行的总经理才许可立案。陈、李、徐等认为如果由宋氏兄弟掌握这个银行的实权，等于把各大银行全部资财命脉交予四大家族掌握，其危险的程度比金融恐慌的危险厉害千百倍，因为结果将是从根本上由宋氏兄弟吞并了各大银行，权衡利害，只好打退堂鼓，还是由各私营银行互相支持，各自设法解决困难，独立自主，保存实力为宜。不动产抵押银行之议，就此作罢。我依然回天津分行任职。这就是当时上海私营金融业内外



交困的真实情况。但实际上当时上海各大银行曾乘银贵金贱的机会，并意识到改革币制现金集中的局面即将到来，已将一部分资金购进外汇存在美国，若万一发生资金周转困难，还可卖出美汇来解救金融危机。这也是各大银行敢于同宋子文兄弟作斗争，宁可放弃创办不动产抵押银行计划的内因。

美国抬高世界银价对中国经济的危害性既是如此之大，按理国民党政府应立即向美国提出严正抗议，然而出于蒋政权的媚外本质，一直延迟到1934年8月20日方由财政部长孔祥熙向美国政府提出软弱无力的照会，轻描淡写地指出美国政府违背了伦敦白银协定稳定世界银价的精神。

三、国民党政府向美英两国乞求援助遭到 拒绝和日本妄图垄断中国货币的野心

在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后不久，孔祥熙在美籍顾问杨格的建议下，向美国表示中国愿以白银向美国交换黄金，以便放弃银本位实行金本位，美国政府拒绝了这一建议，声称：如果中国想以银换金，尽可自己在自由市场上进行。^①

尽管国民党政府以银换金的建议遭到美国拒绝，但蒋政权仍不死心。1934年12月10日，孔祥熙再次照会美国政府，希望美

^① 《中央银行英文档案》。

国政府能给予中国一笔币制改革的贷款，或对美国以外出产的白银收购价格不要超过每盎司美金4角5分，这样中国元的相应汇价就将是每元合美金3角4分，也只有在这样的汇价下，中国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对于孔祥熙这一建议，当时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的意见有分歧。国务院不赞成贷款给中国，因为担心这将与日本的“天羽声明”相抵触，从而激怒日本；主张美国财政部暂停收购白银，或至少将白银收购价降至美金4角5分。美国财政部则认为，从政治上来考虑，美国政府不能在白银政策上作任何让步，即使最终可能促使中国脱离银本位，美国仍有必要继续收购白银，折中的解决办法是暂时将银价维持在每盎司美金5角5分的水平上，以待中国和美国国会领袖们就此达成谅解。后来罗斯福总统同意了财政部这一意见，于12月18日致电国民党政府，告以愿将收购国外白银的价格维持在每盎司美金5角5分的水平上，并表示今后如果要变动银价，将于一周前通知中国政府。但就是这样的答复也遭到了美国国会白银集团的坚决反对，以致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不得不马上收回这一成命。^①

这里顺便提一下当时的日本“天羽声明”和美国白银派议员的势力，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美国政府的处境和罗斯福为什么在这一问题上一直采取犹豫观望的态度。所谓的日本“天羽声明”，指的是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向

^① 杨格：《中国建国之努力》223—225页。布鲁蒙：《摩根索日记综述，1929—1938危机年代》205页。